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四期
2014 年 3 月　　頁 149~184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

謝　明　陽*

提　　要

方以智，一位明末清初著名的詩人與思想家。本文將討論的是，方以智在崇禎五年（1632）與陳子龍相識，開啓了詩派思想的序幕，其後，順隨著方以智生活與知識的擴延，以及與周岐、孫臨諸子交往，型塑了其所建立的詩派特色，直到順治七年（1650）與錢澄之、吳德操在桂林重逢，明代詩派的發展可以告一段落。因此，文章將從「龍眠詩派的名義」作爲起始，說明以龍眠之名來稱呼該詩派的要旨；其次則以「澤園永社時期」、「金陵廣集時期」、「諸子離散時期」三個階段，來論證方以智創立詩派的發展過程。如此的考察，相信對於我們認識晚明詩歌史具有特殊的意義。

關鍵詞：龍眠詩派、方以智、周岐、錢澄之、吳德操

本文於 102.12.18 收稿，103.03.12 審查通過。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DOI: 10.6281/NTUCL.2014.03.44.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ang Yi-Zhi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Long-Mian Poetic School

Hsieh Ming-Yang*

Abstract

Fang Yi-Zhi is a renowned poet and thinker in the late Ming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ies. He meets Chen Zi-Long in 1632, which initiates his poetic school thoughts. After associating with scholars such as Zhou Qi and Sun Lin, he expands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and establish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ic school he founds. His reunion with Qian Cheng-Zhi and Wu De-Cao in Guelin in 1650 marks the end of poetic school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ming of the Long-Mian poetic school, and then exemplifies the process of the school's foundation b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periods: the Yong Club in Ze Garden, the great gathering in Jinling, and the dispersion of scholars. This exploration provides a special meaning for understanding late Ming poetry history.

***Keywords*: Long-Mian poetic school, Fang Yi-Zhi, Zhou Qi, Qian Cheng-Zhi, Wu De-Cao**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以智與龍眠詩派的形成

謝　明　陽

一、前　言

方苞（1668-1749）〈田間先生墓表〉提到，同鄉前輩錢澄之（1612-1693）於明末崇禎年間曾參與黨社活動：

> 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密之、職之，而先生與陳臥子、夏彝仲交最善，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1]

這段文句影響頗廣，後來《清史稿》和《桐城耆舊傳》爲錢澄之立傳，均沿用此說，認爲錢澄之曾與陳子龍（臥子，1608-1647）、夏允彝（彝仲，1596-1645）等人共聯「雲龍社」，[2] 以接續東林學派的學風。及至當代，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也將「雲龍社」列爲晚明時期活動於南直隸地區的文人結社，[3] 李聖華《方文年譜》亦於「崇禎九年丙子」條述及：「錢澄之與龍眠士

---

1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卷 12，頁 337。沈眉生，即沈壽民（1607-1675）；吳次尾，即吳應箕（1594-1645）。

2 參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卷 500，〈遺逸一〉，頁 13834；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臺北：廣文書局，1978 年），卷 7，〈錢田閒先生傳〉，頁 307-308。

3 參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3、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結雲龍社，以聯吳淞，或在是年前後。」[4] 二家所述顯然都是直接上承方苞之說。然而，雲龍社究竟是怎樣的一個社團？迄今卻未見學者詳加討論。事實上，方苞的這段敘述並不精確，首先是字號問題，方文（1612-1669）之字爲「淦山」，不宜寫作「塗山」；方其義（1619-1649）之字爲「直之」，文中卻誤作「職之」。今取咸豐元年所刊行的《望溪先生文集》觀之，[5] 可知此誤由來已久。更重要的是，當時雲間文人與龍眠文人雖然交往密切，但並未共組文社，「雲龍社」的名號嚴格說來並不恰當。

請看方以智（1611-1671）《膝寓信筆》所記：

> 雲間、龍眠唱和相得，故舒章有「雲龍」之目。頃言少年英發，有宋轅文，飛兔也。吾亦言吾里輩出，才故日生，惟以學識蘊藉相勉爲貴。[6]

方以智爲雲間詩人宋存標題〈宋子建秋士集序〉亦云：

> 集目始于壬申，則余初過雲間之歲也。當是時，合聲倡雅，稱「雲龍」焉。[7]

可知「雲龍」並不是社團名稱，而是「集目」，亦即只是雲間、龍眠兩地詩人集會唱和的一個稱謂。此一名號最初是由李雯（舒章，1607-1647）所創，時在崇禎五年（壬申，1632），命名係從雲間、龍眠兩個地名各取首字而組成。再參考方以智〈感雲間和詩書次前韻〉之句：「陳李風流如在坐，謂臥子、舒章也。雲龍唱和舊同聲。大雅之壇坫，惟龍眠與雲間倡之。」[8] 可以推想，「雲龍」一名應該寄託著〈乾文言〉論九五所云「雲從龍，風從虎」、「同聲相應，同氣

4 李聖華：《方文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卷 2，頁 82。

5 參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20-1421 冊），卷 12，冊 1420，頁 448。

6 清・方以智：《膝寓信筆》（東京：東洋文庫藏，《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頁 21。

7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3 冊），〈後編〉，卷 1，頁 665。

8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98-99 冊），卷 43，冊 98，頁 5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相求」[9] 之義，亦即此名除了緣於兩地地名之外，也寓示著對於崇高理想的渴望。

「雲龍」的名目涵蓋了兩個地邑性的詩人群體：一爲來自於松江府華亭縣的雲間詩人，一爲來自於安慶府桐城縣的龍眠詩人。其中，以陳子龍爲首的雲間詩人群體，向來被稱爲「雲間派」或「雲間詩派」，以此類推，以方以智爲首的龍眠詩人群體，也應該被稱爲「龍眠派」或「龍眠詩派」。只不過，同樣以重振明代復古詩學爲使命，龍眠詩派的復古立場不及雲間詩派堅定；方以智兼具哲人、學者、高僧的多重身分，也不如陳子龍的詩人形象來得明確。這些緣故，使得龍眠詩派自清初以來一直較少受到詩家與學者的關注，有鑒於此，本文嘗試著對方以智所領導的龍眠詩派作一論述。下文，將先討論龍眠詩派的名義，而後分成「澤園永社」、「金陵廣集」、「諸子離散」三段時期來描述龍眠詩派的形成經過，希望藉由本文的探討，能刻劃出此一晚明重要詩派的活動過程與詩學特徵。

二、龍眠詩派的名義

詩派之名是對於詩派之實的指稱，有其實方有其名，因而其名必然後出。比如陳子龍領導的雲間詩派活動於晚明，然「雲間派」或「雲間詩派」的稱謂，卻是入清之後才逐漸定名。[10] 同樣的，「龍眠詩派」之名雖未正式見諸史籍，但以此名來稱呼方以智領導的桐城詩人群體，並不難找到成立的理由。試觀吳偉業（1609-1671）〈致孚社諸子書〉云：

> 弇州先生專主盛唐，力還大雅，其詩學之雄乎！雲間諸子，繼弇州而作者也；龍眠、西陵，繼雲間而作者也。風雅一道，舍開元、大曆，其將

[9]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十三經注疏》本），卷 1，頁 15。

[10] 參拙著：《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 年），頁 19-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誰歸？[11]

再觀毛奇齡（1623-1716）〈龍眠風雅序〉云：

予思江左言詩，首推雲間。近代聞見，頗稱錢氏。當夫黃門崛興，與海內爭雄，一灑啓、禎之末馹獪餘習，而其時齊驅而偶馳者，龍眠也。故「雲龍」之名，彼此並峙。[12]

依吳偉業之說，雲間、龍眠的關係屬於縱向的傳承；依毛奇齡之說，二派的關係則是橫向的並列。這兩種說法各有理據，若以詩學觀念而論，龍眠詩派曾受到雲間詩派的影響，或可謂「繼雲間而作者」；但以詩派的活動時間而論，雲間、龍眠皆活躍於崇禎一期，二派又當屬「齊驅而偶馳者」。儘管考察的角度有別，但基本上吳偉業和毛奇齡皆將龍眠獨立於雲間之外，可證當時確有此一詩歌派別的存在，稱呼此派，自當以「龍眠詩派」一名最爲適合。

雲間、龍眠齊驅偶馳，雙方的主將分別是陳子龍和方以智。方以智次子方中通（1634-1698）〈丁酉秋日父執冒樸巢大會世講于白門〉一詩有「雲龍壇坫舊知名」之句，句下自注：「老父與陳臥子先生力倡大雅，向有『雲龍』之稱，謂雲間、龍眠也。」[13] 其說正是將雲龍唱和聚焦於陳子龍與方以智身上。方以智在龍眠詩派中的領袖地位尚有文獻可徵，例如錢澄之曾作〈憶龍眠〉五首，此組詩第一首懷念方以智，詩作開端即云：

龍眠君領袖，一第早飄零。[14]

此詩雖作於龍眠諸子飄零之際，但同派成員的證詞，最具效力。另一詩派成員

[11] 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54，頁 1087。

[12]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國學基本叢書》本），〈序十二〉，頁 397。錢氏，指錢謙益（1582-1664）；黃門，指陳子龍。

[13] 清・方中通：《陪詩》，收入《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33 冊），卷 1，頁 78。

[14] 清・錢澄之：《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藏山閣詩存〉，卷 7，頁 1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岐（1608-？）在爲方以智作〈稽古堂二集序〉時，更說道：

> 國家數百年而大文人不數出，東南自弇州後，寥寥矣。天生密之，兼才博學，豈尋常哉！[15]

弇州山人王世貞（1526-1590）爲復古派鉅子，於李攀龍（1514-1570）歿後，「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16] 周岐以王世貞的繼起者來期許才學無雙的方以智，推崇甚高，其心目中，方以智既然是日後最有希望的文壇主盟者，必然也是當下龍眠文人的領袖。至此，我們可以爲「龍眠詩派」的涵義略作界說：此派是指晚明時期由方以智領導的桐城詩人群體所形成的詩歌流派。

「龍眠」原爲山嶽名稱，對於此名，可以再作疏釋。弘治年間擔任桐城縣訓導的許浩有〈遊龍眠山〉一詩，詩云：「大小二龍山，連延入桐城。山盡山復起，宛若龍眠形。」[17] 可知龍眠山是由大龍山和小龍山組成，二脈蜿蜒起伏，宛若雙龍靜眠，故得此名。再看康熙《安慶府志》的描述：

> 龍眠山，北五里，與華崖並峙。有岩有壑，多峭壁，俯清流，逾深逾佳，逶迤窈眇，擅江北名山之秀。宋李公麟爲泗州參軍，歸老於此，號龍眠居士，自繪〈龍眠山莊圖〉，蘇東坡爲之跋，穎濱亦屬題詠焉。[18]

龍眠山位於桐城縣北，距縣城僅有五里。此山峭壁聳峙，深谷窈窕，不僅是江北的地理名勝，同時也具有特殊的文化意涵。宋代畫家李公麟晚年歸隱山中，自號龍眠居士，嘗作〈龍眠山莊圖〉，蘇軾爲題〈書李伯時山莊圖後〉，文云：「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

---

15 《浮山文集》，〈前編〉，卷 2，頁 470。

16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卷 287，〈文苑三〉，頁 7381。

17 清・廖大聞等修，清・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道光七年刊本），卷 1，〈輿地志〉，頁 16。許浩，浙江餘姚人，參同書，卷 6，〈職官表〉，頁 129；卷 9，〈名宦志〉，頁 282。

18 清・陳焯等纂修：《安慶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中國方志叢書》影印康熙十四年刊本），卷 3，〈山川〉，頁 3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19]對於李公麟的畫作，給予了自合天機、神交萬物的至高評價。蘇轍也奉其兄之命，作五言絕句〈題李公麟山莊圖二十首〉，敘云：「子瞻既爲之記，又屬轍賦小詩凡二十章，以繼摩詰輞川之作云。」[20]知其作欲使詩畫交融爲一，以上承王維的〈輞川圖〉與〈輞川集〉詩。李公麟的畫作、蘇氏兄弟的詩文，讓龍眠山在自然風景之外更增添了人文風景的深度，也使得此座逶迤於桐城北郊的名山，成爲薰陶桐城士子學養與人格的最佳場所。陳焯（1619-1692）〈龍眠風雅序〉即指出：

> 龍眠之爲山，深秀而迴複，蟫蜒百里，自爲奧區，於天柱諸峰，無所附麗。士生其間，稟山川蒼迴沉鬱之氣，人尚實學，不競浮名。尚實學，則含英咀華，先求根柢，風騷、樂府，户習家傳，雖閨閤童孺之言，必無麤野寒儉之態。不競浮名，則適性緣情，各攄才致，外誘莫奪，世趨莫移。[21]

其說認爲，桐城文人尚實學、不競浮名的學風，正是稟受龍眠山的靈秀蒼鬱之氣而形成。正因爲尚實學，故而桐城詩人學詩必奠基於風騷、樂府；又因爲不競浮名，故而得以形成各適才情的詩風取向。龍眠山對於桐城文化具有如此關鍵的影響，「龍眠」一名也順理成章的成爲桐城的代稱。例如錢澄之曾選《龍眠詩錄》一書，自道：「吾龍眠稱詩幾百年，作者如林。」[22]潘江（1619-1702）也曾編輯《龍眠風雅》，自釋書名曰：「此吾龍眠之風雅云爾，如謂方駕三百，比宣聖刪定之書，微獨予不敢誣昔賢，即昔賢地下有知，亦不敢自誣也。」[23]二書書名以及文中所使用的「龍眠」一詞，其義已非止於山嶽，而是擴大意涵，以之代指桐城一邑。

---

[19]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70，頁 2211。
[20] 宋・蘇轍：《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 16，頁 386。
[21] 《龍眠風雅》，冊 98，頁 4。
[22] 清・錢澄之：〈龍眠詩錄引〉，《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卷 16，頁 299。
[23] 〈龍眠風雅發凡〉，《龍眠風雅》，冊 98，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以智的成長過程中，龍眠山同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龍眠後遊記〉云：「余生長龍眠，歲徜徉其間。」又云：「余幼讀書處，在寥一峰下，有澗石急湍，可以流觴。」[24] 方以智幼時的讀書處寥一峰，即在龍眠山中，正因爲受到龍眠山的孕育而成長，故方以智自號「龍眠愚者」，[25] 嘗有詩云：「海內只今信寥落，龍眠山下有狂生。」[26] 龍眠狂生也是方以智對於自己的稱謂。流離他鄉之後，龍眠山更成爲方以智心中的故鄉表徵，〈龍眠後遊記〉又云：

> 余少以龍眠之泉無千仞、石無萬仞者，或不得廁三峽、石門，然長遊吳越，近寓白門，大氐水爲巨浸，山多土阜，曠觀平遠，求一仞之泉、十仞之石，不可得矣。人所號名山，率以古刹、園亭勝耳，抑亦入山惟恐不深，故厭之與？乙亥遊東越，山果峭，稍稍似故鄉，然又安能如故鄉之山，可以菑畬不買而隱也？[27]

方以智少時以爲龍眠山之險峻尚不足以和長江三峽、天水石門並列，但遊歷吳越後，發現江南名山大抵以古刹、亭園等人工建築取勝，其實不過土阜小丘耳；即使浙東諸山較爲峭拔，但眞能令離鄉遊子魂牽夢繫者，仍然是故鄉的龍眠山水。〈龍眠後遊記〉作於崇禎十二年（1639）春日，方以智當時雖然年未三十，但在離鄉多年之後，卻也透露了隱居龍眠山的渴望。當日登山，在舅氏吳道凝（1612-1655）的提議下，方以智邀請工於丹青的從兄方豫立（1607-？）同行，希望借助從兄的絕妙畫筆，繼李公麟之後續作〈龍眠圖〉，[28] 此一舉

---

[24] 分見《浮山文集》，〈前編〉，卷 3，頁 508、509。

[25] 《龍眠風雅》云：「方以智，字密之，號曼公，自稱龍眠愚者。」見《龍眠風雅》，卷 43，冊 98，頁 561。

[26] 〈柬農父呈子遠舅氏〉之句，轉引自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黃山書社，1983 年），卷 1，頁 59。此詩爲崇禎五年作，原見《博依集》。

[27] 《浮山文集》，〈前編〉，卷 3，頁 509。

[28] 〈龍眠後遊記〉：「頃之，子遠舅氏大呼而至曰：『是不可以無圖，李伯時所以重後世者，此〈龍眠山莊圖〉也，若近日工丹青，固可闕然遜伯時耶？』言未畢，吾家子建，適稅駕至自潛天柱峰，即招之曰：『有今日〈龍眠圖〉矣。』子建素工此，十倍我，問其囊中，則筆札備具，即竝駕共出北門。」見《浮山文集》，〈前編〉，卷 3，頁 508。方豫立，字子建，方若洙子，方大欽孫，方學漸曾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止，除了附庸風雅之外，也表現出桐城遊子對於故土的眷戀之情。如此說來，以「龍眠」指稱方以智領導的詩派，不僅可吻合於當時文壇慣用的稱謂，同時也點出了派中詩人心靈依歸的所在。

三、澤園永社時期

崇禎五年（1632），方以智出遊吳越，在杭州西湖結識了陳子龍，如《膝寓信筆》所記：「壬申遊西湖，遇陳臥子，與論大雅而合。」[29] 又如〈熊伯甘南榮集序〉云：「壬申遇臥子于西湖，一歌而合；癸酉伯甘公車，過稽古堂，慰我博依。力倡大雅，歸于中和，許銅盤矣。」[30] 二說皆將方以智與陳子龍論詩相合的重點，指向了「大雅」之聲。是年秋，方以智過訪雲間，再度與陳子龍相晤，陳子龍作〈遇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二首，其二開端云：「仙才寂寞兩悠悠，文苑荒涼盡古丘。」[31] 詩句中，敏銳的將自己與方以智並列爲仙才，並且隱隱暗示，兩位仙才將各自帶領著詩派成員，爲荒涼的文苑開啓新聲。正因爲與陳子龍的此番相識，方以智返回故鄉桐城後，立即與同鄉文友共結「永社」，試圖與雲間詩人隔江呼應，共倡大雅。

方以智〈澤園興永社〉一詩曾記錄永社的創立情形：

> 南郊有小園，修廣二十畝。開徑蔭松竹，臨水垂楊柳。西北望列嶂，芙蓉青户牖。築室曰退居，閉關此中久。晨起一卷書，向晚一尊酒。偶然遊吳越，天下浪奔走。大雅殊寂寥，黃鍾讓瓦缶。雲間許同調，歸來告親友。結社詩永言，絃歌同杵臼。河梁如噶矣，風騷爲敝帚。聊以寫我心，何暇計不朽！[32]

---

29 《膝寓信筆》，頁 8。

30 《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39。熊伯甘，即熊人霖（1604-1667）。

31 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卷 13，頁 415。

32 《龍眠風雅》，卷 43，冊 98，頁 5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桐城南郊有小園，名曰澤園，對照周岐〈澤園永社十體詩引〉云：「澤園臨南河，取『麗澤』之義，方潛夫夫子璽卿告假還鄉所建也。密之閉關誦讀其中，學耕會友而歌以永言，不枯不亂。荷薪之家風，善哉！」[33] 可知此園是由方以智之父方孔炤（潛夫，1591-1655）所建。方孔炤於天啓初任兵部職方司郎中，天啓五年（1625）因忤魏璫而削籍返里，[34] 澤園的興建始於是年；周岐說方孔炤「告假還鄉所建」，其實是委婉的說法。澤園建成之後，方以智在園中的退居室閉關讀書，此園的命名取自「麗澤」之意，語出〈兌卦・大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35] 宋儒呂祖謙以及明代東林書院的講堂皆名「麗澤堂」，即是取義於此。接續此一傳統，方以智遵循著父親的期勉，與同里親友共結「澤社」，切磋論學於澤園之中。方以智〈史漢釋詁序〉篇末附記：「崇禎戊辰冬，方以智書于澤社。」又〈爲揚雄與桓譚書〉題下小注：「辛未澤社課。」[36] 戊辰爲崇禎元年（1628），辛未爲崇禎四年（1631），此段時間正好是澤社的活動時期。方以智〈送周農父還故鄉序〉還說道：「予自束髮交農父，至文弱，當澤社咏歌，志必于儒者。」[37] 可以探知澤社的活動內容在於習詩作文，探求經義。至崇禎五年（1632）冬，方以智浪遊歸來，遂邀集澤社文友改立永社，前引詩句云：「大雅殊寂寥，黃鍾讓瓦缶。雲間許同調，歸來告親友。結社詩永言，絃歌同杵臼。」正說明了成立永社的目的在於以詩永言，期望與雲間詩人共同創造詩歌的新風貌。

「澤社」與「永社」的關係密切，但仍應有所區隔。羅熾《方以智評傳》說：「澤社亦稱永社。」[38] 宋豪飛〈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也說：「永社一

[33] 轉引自《方文年譜》，卷 1，頁 35。原見《方密之詩抄》。周岐此文作於崇禎五年，當時方孔炤官任尚寶司卿，故以「璽卿」稱之。
[34] 參《方以智年譜》，卷 1，頁 34-35。
[35] 《周易正義》，卷 6，頁 130。
[36] 分見《浮山文集》，〈前編〉，卷 2，頁 473、477。
[37] 《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40。
[38] 羅熾：《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澤社，或作澤園永社。」[39] 這樣的看法，僅著眼於澤社、永社活動地點與社中成員的相同，不免忽略了二社成立時間與立社宗旨的差異。李聖華《方文年譜》「天啓五年乙丑」條則認爲：「澤社之創，當始於今年。崇禎五年冬，方以智、方文等在南園立永社，取而代之。澤社爲文會，以備科舉之用。」[40] 此說指出了永社取代澤社的事實，顯然較前說更爲準確。從澤社到永社，兩個文社不僅成立的時間先後不同，以命名觀之，也透露了文社性質的變化。蓋澤社之「澤」，係因澤園而定名，固取「麗澤」之意，但只是指稱朋友論學的一般文會；永社之「永」則不然，據方以智「結社詩永言」、周岐「學耕會友而歌以永言」之句，可推斷此一命名源自《尚書・堯典》所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41] 意謂永社是更爲嚴謹的詩社。而一個詩社的成立，除了詩人群體之外，還應該具備足以凝聚社中成員的共同理想，永社的詩學信念在於與雲間詩人力主大雅，所謂「河梁如噶矢，風騷爲敝帚」，亦即尊奉漢詩爲取法的開端，《詩經》、《楚辭》也是值得敝帚自珍的前代佳作。

永社由澤社演變而來，二社的成員大致相當，均可由方以智〈孫武公集序〉推知大概：

> 余往與農父、克咸處澤園，好悲歌，蓋數年所，無不得歌至夜半也。農父長余，克咸少余，皆同少年，所志同，言之又同。往往酒酣，夜入深山；或歌市中，旁若無人。人人以我等狂生，我等亦相謂天下狂生也。余有叔爾止、舅氏子遠，雖非同輩，而年相若，且引繩排根，不知何故風若。惟老父嘗戒之，然感於中，形於聲，不能禁也。[42]

---

[39] 宋豪飛：〈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安徽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頁 47。

[40] 《方文年譜》，卷 1，頁 35。將澤社的創立繫於方孔炤解印歸里的天啓五年（1625），只能說是合理的推測，未必是確切時間。

[41]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十三經注疏》本），卷 3，頁 46。其文原在〈堯典〉，僞古文《尚書》析爲〈舜典〉。

[42] 《浮山文集》，〈前編〉，卷 2，頁 4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澤園文友中，方以智和周岐（農父）、孫臨（克咸，1611-1646）過從最密，三人好慷慨悲歌，以天下狂生自目。此外，方以智從叔方文（爾止）、母舅吳道凝（子遠），名義上雖是長輩，但年齡相當，同樣也是志同道合的夥伴。可知永社的組成應以澤園主人方以智爲首，主要成員尚有周岐、孫臨、方文、吳道凝。參考方文後來的回憶詩句：「南國風騷永社興，孫郎年少骨嶙嶒。」[43] 亦可證方爾止與孫克咸確實在永社陣營中。

關於永社的詩學思想，周岐〈澤園永社十體詩引〉中有具體的說明：

> 《詩》居六經之先。不學《詩》，無以言，興觀群怨，遠邇多識，自勺象以立成，莫不由此，眞鼓舞之先幾乎！永社立十體會，分一題以大雅爲宗，以切當爲工，以飛躍爲致，以高逸爲韻。達材驗學，既論其志，足觀所養矣，將謂天下景從可也。崇禎壬申仲冬，即山周岐農父題。[44]

周岐的論述可總攝於「以大雅爲宗」一句。此「大雅」詩學的內涵，強調詩歌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能使讀者賦詩專對、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45] 這是儒家政教詩學的一種溫習；但對於永社的年輕詩人而言，當務之急更在於學習前代的大雅詩歌，進行詩藝的鍛鍊與琢磨。因此，永社立十體之會，希望社中諸子創作各體詩歌時，皆能以工整切當、情致飛躍、格韻高逸作爲審美標準，進而以詩言志，以歌永言。永社「十體」的詳細內容，見於方以智〈永社十體詩序〉：

> 永社十體，首古歌辭，以〈卿雲〉、〈八伯〉、〈獲麟〉、〈大風〉等有兮侯之聲也；曰風雅體者，以三百篇，不限定通章四言也；五言古，

[43] 清・方文：〈孫振公招同戴山民，道及諸子夜集談詩，因懷其叔克咸職方〉，《方舟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 年），《舟山集》，卷 8，頁 321。此詩作於順治九年（1652）。孫振公，即孫中麟；戴山民，即戴宏烈。二人亦桐城人。

[44] 轉引自〈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頁 50；及《方文年譜》，卷 1，頁 54。原文見於方以智《方密之詩抄》。

[45]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河梁、〈十九首〉尚已，曹、阮、陶、杜庶幾近之；七言古實兼長短歌行，以唐之起伏、陡峭、雷碾、頓挫者足法也；近體五、七言律，當從王、孟入老杜，而義山之刻豔、香山之爽快，皆可收也；絕句，愈少愈難蘊藉；排律大似鬥寶，比事工巧，難於老當，尤難於章法流動耳。噫！詩轉風聲，各發其感，豈徒論資格已耶？養氣讀書，考事類情，會友麗澤，固鼓舞之一端也。崇禎壬申冬，澤園主人方以智識。[46]

據此，永社十體應包含：古歌辭、風雅體、五言古、七言古（含長短歌行）、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從方以智標舉的典範詩作來看，永社詩人確實秉持著七子派的基本立場，以漢魏古詩、盛唐律詩作爲主要的學習對象，然而取法範圍卻不僵化，其中五言古詩可以下及陶淵明、杜甫，五、七言律詩也不妨兼收李商隱、白居易。五言古詩、五七言律詩之外，方以智也將其他各種體裁列入學習範圍，此意圖兼備眾體的詩學立場，如同胡應麟（1551-1602）《詩藪》所言：「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何忝名世？」[47]展現的其實是明代復古派詩人一貫的集大成思想。[48]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與雲間詩人合倡大雅，龍眠詩人尋求大雅之音的途徑仍與雲間詩人不盡相同。例如陳子龍〈幾社壬申合稿凡例〉提到：「文當規摹兩漢，詩必宗趣開元，吾輩所懷，以茲爲正。至於齊梁之贍篇，中晚之新搆，偶有間出，無妨斐然。」[49]除了雅正之音以外，雲間詩人同時也追索齊梁贍篇、中晚唐新構，顯然是「雅／豔」並重的詩學進路。方以智領導的龍眠詩人則有屬於自己的方向，且看方以智於澤園永社時期所作的〈讀十九首〉：

---

[46] 轉引自〈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頁 50；及《方文年譜》，卷 1，頁 54。原文見於方以智《方密之詩抄》。

[47]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續編〉，卷 1，頁 349。

[48] 關於明代復古派詩人的集大成思想，可參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55-62。

[49] 明・杜騏徵等編：《幾社壬申合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34-35 冊），冊 34，陳子龍：〈幾社壬申合稿凡例〉，頁 4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僦居陋巷希朋友，叢薄荒塵入甕牖。韋帶無用黃金裝，蓬室瓦爐熏敝帚。昔愛《老子》言五千，今誦河梁〈十九首〉。古人比興多支離，兒女語吐英雄悲。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高樓一聲落葉飛。[50]

鍾嶸《詩品》說〈古詩〉「意悲而遠」，又說李陵詩「文多悽愴，怨者之流」；[51] 同樣的，方以智誦讀李陵〈與蘇武〉（攜手上河梁）以及〈古詩十九首〉，也在委婉悠圓的體格聲調中，感受到二作能借兒女之語道出英雄之悲。英雄之悲，正好是「好悲歌」的澤園狂生壯志難伸的心靈寫照，故方以智更直接引用〈西北有高樓〉「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52] 之句，藉以抒發傷懷。此種以生命悲愁接受典範詩作的讀詩方式，可以擴展成復古理念的實踐，形成融合「悲／雅」的創作模式，雖然此一創作模式於澤社時期僅略具雛型，但卻預示著龍眠詩派未來的詩風發展方向。依照陸機〈文賦〉所言，「雖悲而不雅」、「既雅而不豔」[53] 皆爲文章之病，那麼可以反過來說，雲間詩派的審美理想正在於「雅而豔」，龍眠詩派的審美理想則在於「悲而雅」，二派所追求的大雅之音，於雲龍唱和的開始，已隱微的表現出屬於個別詩派的特質。

四、金陵廣集時期

崇禎七、八年（1634、1635）間，桐城因賊寇作亂而戰火頻起，永社諸子陸續避居於金陵，澤園的唱和因而告一段落。方以智《膝寓信筆》記載：「浮

---

50 《龍眠風雅》，卷 43，冊 98，頁 569。《龍眠風雅》中，此詩排在〈滅賊行〉前兩首，而〈滅賊行〉是《方子流寓草》中七言古詩的第一首，可推知此詩應收在《博依集》中，當作於澤園永社時期。

51 分見南朝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詩品上〉，頁 75、頁 88。

52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卷 29，頁 1345。

53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山愚者流寓白門，僦居城南，迻而城西，土人呼鐵獅子宅，茅止生之舊居也。……妹夫孫克咸與我爲鄰，周農父隔一二巷。」[54] 偕周岐、孫臨流寓白門，爲崇禎七年秋之事。方以智〈哭外祖吳觀我先生〉詩序又云：「流寓既久，子遠舅氏載外祖觀我先生遺集南來……。」[55] 可知吳道凝渡江南來的時間稍遲，當在崇禎八年春。[56] 另外，方文〈金陵感懷十首〉序文也提到：「甲戌、乙亥避流寇之亂，徙家於此。」[57] 甲戌、乙亥，即崇禎七年、八年。也就是說，崇禎八年時，永社的主要成員均已暫別故鄉，聚合於金陵。

說起晚明金陵，讓我們聯想到余懷（1616-1696）《板橋雜記》中的描繪：「金陵爲帝王建都之地。公侯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賓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眞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58] 金陵帝都爲王孫貴族、四方文士往來駐足的輻輳之區，與桐城澤園的封閉狀態迥然不同，流寓於此的永社詩人必須告別過往的自足天地，融入風起雲湧的江南文壇，廣與天下英豪酬唱締交。此時，金陵仍爲昇平樂國，但桐城卻成爲殺戮戰場，二地呈現鮮明的對比，方以智等龍眠士子來到欲界仙都，一方面無可避免的縱情於酒色之歡，一方面卻又承受著思念故園之悲，生命於是陷入哀樂兩極的矛盾拉扯之中。這樣的生命際遇，使得龍眠詩派的發展進入了有別於澤園時期的新階段。

龍眠詩人於金陵時期的詩學活動，以方以智〈置酒行爲永社廣集補作〉五首的描述最爲完整，俱錄其詩如下：

---

54 《膝寓信筆》，頁 1。茅止生，即茅元儀。

55 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50 冊），卷 7，頁 720。

56 方以智、吳道凝流寓南京的時間，參《方以智年譜》，卷 2，頁 64-65、68。

57 《方㠯山詩集》，《㠯山續集前編・徐杭遊草》，頁 518。

58 清・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上卷，〈雅游〉，頁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吾邑有數子，永社所繇興。載筆逢亂離，相顧棲金陵。客從四方來，投我以綵繒。閉門誠所願，謝之又不能。勉強答悲歌，悲來何以勝？大市或卜隱，軺車或見徵。時時作高會，置酒娛良朋。雨花雖小阜，躡屐亦可登。秦淮雖勺水，樓船亦可乘。廣集結長珮，竟夜張高燈。作詩紀其事，愼勿爲人稱。（其一）

此地好繁華，日日聞簫鼓。非爲宴公侯，即是聚歌舞。輕紈綺席前，有論不敢吐。退與二三子，放言及上古。一夜思得之，書生何大苦？明日盛衣服，賢豪迭賓主。遣使召紅粧，冰絃促玉柱。雖無絕世人，問年多十五。飲酒隨風俗，傍人乃不怒。四座請盈觴，聽我新樂府。（其二）

四月牛首還，遂有鍾山集。嗣是多良辰，燕會踵相及。海內存故交，來往手可執。往者數寄書，來者市中揖。飄風上河梁，車第塵沙入。芳草當路枯，城烏暮飛急。仰視常大笑，俯首常涕泣。沽酒非醇醪，聊以解於邑。酒前陳古辭，古辭不當襲。自有一時懷，直敘成篇什。（其三）

寒冬各言歸，留此不數客。舅氏再主盟，迫歲浮大白。向入辟疆園，今假將軍宅。合得移家者，分坐有餘席。時值大風雨，臥病當此夕。農父守師塾，克咸治矢石。是時聞懽甚，主人先岸幘。一呼起浩倡，上客皆辟易。翼日道盛事，歌詠成書冊。始信龍眠人，一可以當百。（其四）

嘉會一以往，令人翻追思。永社稱廣集，屬我補其辭。落筆成變調，骫骳不自知。時方絕交遊，堅忍下重帷。轉問一年中，自述還自嗤。旬月斷飲酒，獨醒何所爲？題曰置酒行，一飯常歌之。（其五）[59]

此詩的寫作背景可參考《膝寓信筆》所記：「子遠舅氏廣永社，集諸公於南園，余病不能赴，後補古詩五首。永社者，龍眠之十體詩社也。是日，湯日、六叔、農父、克咸皆他遊，不在此，故云『始信龍眠人，一可以當百。』」[60]崇禎十年（1637）冬，[61]吳道凝以桐城永社的名義廣邀各地詩人參與集會，號

[59] 《方子流寓草》，卷 2，頁 677-678。
[60] 《膝寓信筆》，頁 23。
[61] 繫年參《方文年譜》，卷 2，頁 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稱「永社廣集」。廣集當日，方以智因病無法參加，堂舅吳道新[62]（湯日，1602-1683）、六叔方文、社友周岐、孫臨也都另有他遊，永社諸子實僅吳道凝一人主盟盛會，並且以一當百，力抗座中群雄。方以智身爲永社領袖，於事後受舅氏之請，補作此組古詩。另外，孫臨有〈今日良宴會爲吳子遠開永社廣集〉一詩，詩中提及：「聞君開綺席，秦淮人不數。四座欲高談，對子不成句。子數多大言，骯髒先時務。此夜左席虛，以我不能赴。」[63] 同樣也是缺席者的追述之作，記錄的重點在於想像吳道凝高亢賦詩，眾多與會者皆難匹敵。

但與孫臨的〈今日良宴會〉不同，方以智〈置酒行〉五首記錄的不僅是永社廣集而已，同時也包含了流寓金陵以來的其他宴集與個人心境。第一首從永社之興、流離之故寫起。初居金陵時，方以智雖欲閉門謝客，但在良朋盛情邀約之下，不得已而時作高會，或登雨花臺，或遊秦淮河，如此「廣集」亦可云樂，然在下筆酬唱時，卻無法按捺離鄉的哀愁，只能勉強答以悲歌。第二首又加倍鋪陳外在環境與內在心理的衝突。生活於繁華金陵，日日簫鼓歌舞，在輕紈綺席之前，如何能傾吐眞言？方以智嘗退而與周岐、孫臨二三子放言上古，思欲有爲於當世，但這樣的理想懷抱，總又難敵次日醇酒美人的誘惑。除卻盈觴賦詩以遣悲懷，似已別無他計。第三首提到的「鍾山集」是崇禎十年（1637）夏天的另一場盛會。[64] 對照《膝寓信筆》云：「鍾山偶集，范仲闇爲主，時劉客生、劉阮仙、謝孺玉、劉杜三、任仙孟、杜于皇及龍眠數子在坐。劉伯宗適至，伯宗正有《白門偶集》之選，今日徵詩，亦稱『偶集』。天下事皆偶也，余賦三律。」[65] 可知鍾山之集是由范文光（仲闇）主持，與會者除桐城詩人外，尚有劉湘客（客生）、劉肇國（阮仙，1613-1658）、謝璠（孺玉）、劉友光（杜三）、任喬年（仙孟）、杜濬（于皇，1611-1687）、劉城

[62] 據此，吳道新亦屬永社成員。吳道新爲吳應賓（1565-1634）之侄，吳道凝之堂兄。
[63] 《龍眠風雅》，卷 40，冊 98，頁 525。
[64] 繫年參《方以智年譜》，卷 2，頁 80-81；《方文年譜》，卷 2，頁 85-87。
[65] 《膝寓信筆》，頁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伯宗，1598-1650）等人，方以智曾於會中賦七律三首。[66] 類似的詩酒聯歡接踵相及，來往文友愈增愈多，無法安定的仍是一顆多愁善感、忽樂忽悲的心，此時，方以智的作品或者酒前陳述古辭，或者直敘胸懷成篇，目的仍在於尋找內心的眞正聲音。第四首的書寫主題正式進入永社廣集。歲末寒冬之日，在吳道凝的主盟下，移家金陵的多位文客假茅元儀（1594-1640）將軍宅作永社廣集。[67] 雖然方以智、周岐、孫臨三位永社主將未能與會，但率先高詠的吳道凝已技驚全場，使四座文客盡皆避易。龍眠詩人才力之高，由此可以想見。第五首則總結全作，詩句中持續表達了對於自我生命的反省。方以智其實已意識到，經過三年的流離，自己的詩歌逐漸趨向激昂剛烈之變調，然而，即使下帷讀書、斷絕飲酒以求得身心的安頓，也不過眾人皆醉我獨醒罷了，又何所而爲？於是，方以智寫下此篇〈置酒行〉，藉以自述，也聊以自嘲。

崇禎十二、十三年（1639、1640）之交，方以智赴京師參加會試，在這之前，與金陵文友的酬酢宴飲始終未輟，故龍眠詩派的金陵廣集時期，當始於崇禎七年秋，止於崇禎十二年底。這一時期，方以智、周岐、孫臨依然是詩派的核心人物，例如李雯〈答方密之書〉云：

> 弟欲以臥子當密之，轅文當克咸，弟當農父，使其旗鼓相值，似皆不肯避舍，不審兄呼爾否？[68]

其說以爲，雲龍唱和的基本態勢是陳子龍、李雯、宋徵輿（轅文，1617-1667）等「雲間三子」與方以智、周岐、孫臨等「龍眠三子」之間的抗衡，此說正凸

[66] 此三律爲〈丁丑仲夏鍾山偶集，同范仲闇、傅玉生、陳士業、劉伯宗、羅玄目、龔當時、謝孺玉、劉阮仙、劉客生、任仙孟、杜于皇暨同邑諸子，分得元字〉、〈再用元字贈仲闇民部〉、〈再用元字贈諸子〉。詩見《方子流寓草》，卷 6，頁 711-712。詩題中的傅玉生，即傅鼎臣；陳士業，即陳宏緒（1597-1665）；羅玄目，即羅日崇；龔當時，未詳。

[67] 「向入辟疆園，今假將軍宅」，意指昔日聚會於冒襄（辟疆，1611-1693）之園，今日則假茅元儀之宅。所謂「將軍」，當指茅元儀，方以智有〈酬茅將軍〉一詩，詩云：「白社嘗千座，黃金賜萬斤。」見《方子流寓草》，卷 7，頁 721。

[68] 清・李雯：《蓼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1 冊），卷 35，頁 5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顯了周、孫二子於詩派中的地位。不過，隨著移居白下的桐城詩人陸續增多，龍眠詩派的陣容也更爲壯大，再觀方以智《膝寓信筆》云：

> 錢鏡水先生少子幼光，子遠舅氏之從鑑在，農父之從子緜，吾弟直之，與陳默公、劉臣向共坐，才皆敏贍，當其得意，三峽橫流。[69]

可知當時僑寓金陵的桐城文人多才思敏贍者，錢志立（鏡水，1567-1640）之子錢澄之（幼光）、吳道凝之堂侄吳德操（鑑在，1612-1653）、周岐之堂侄周曰赤（子緜）、方以智之弟方其義（直之）、以及陳焯（默公）、劉漢（臣向），皆其中佼佼者。這些詩人與方以智共坐聯吟，顯然也可歸屬於龍眠詩派的成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錢澄之與吳德操此時已嶄露頭角，錢澄之〈放歌贈吳鑑在〉云：「爾能下筆風雨驚，我亦有文金石聲。上媿枚馬下李杜，鄉人笑罵兩狂生。狂生挾策天下走，賣賦時人人不受。」[70] 二人上比枚乘、司馬相如，下比李白、杜甫，自負如此，誠然亦屬狂生之流。在龍眠詩派後期的發展中，錢澄之、吳德操甚至取代了周岐、孫臨，成爲派中的關鍵人物。

居金陵時，方以智曾讀到閻爾梅（1603-1679）相贈的詩作，《膝寓信筆》載：「寄書閻古古，古古草復近體，皆悲壯大雅之聲。」[71] 在「大雅」之前冠以「悲壯」，不只適於讚譽閻爾梅詩，也可以視爲方以智與龍眠詩派此一時期的詩風追尋，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詩集，當推刊印於崇禎十二年（1639）的《方子流寓草》。《流寓草》收錄方以智流寓金陵以來的詩作五百餘首，書前有徐世溥（1608-1658）、周岐、宋徵輿、李雯、陳子龍撰寫的序文，諸序皆有可觀之處，但論析龍眠詩學，應以周岐〈流寓草敘〉最爲重要，試觀其說：

> 向也吾黨論詩，于五言古則取其純，七言古取其勁，五七言律暨絕句取其音協。夫審音律，辨雅俗，核詞氣，詩之正也。抑傷于有才無識之士，久爲公安、竟陵所鑠，故示之軌則，無使風雅大意淪胥以亡。若推

69 《膝寓信筆》，頁 24。
70 《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3，頁 96。
71 《膝寓信筆》，頁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索盡道，更有進者。三百篇，一詩也，何以著爲經，確然不朽？則惟孤臬之侶，感時傷事，嵩目撫心，或直言之，或微言之，或慷慨流涕，不禁其長言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盛世之以爲昌言，衰世之以爲藥石也。詩道所以有用，而非浮詞豔語可以高據于壇上者乎！三閭大夫慨然發憤，著爲《離騷》，太史公與之，以爲爭光日月；少陵得其意，悲壯激烈度越諸子矣。[72]

此段論述包含兩個重點：前半段仍延續澤園永社的復古理念，主張寫作五七言古詩、律詩皆應審音辨體，使詩歌符合雅正的準則，如此，才能導正被公安、竟陵二派所斲傷的詩壇風尚；自「若推索盡道，更有進者」以降，周岐轉以「感時傷事，嵩目撫心」、「慨然發憤」、「悲壯激烈」一類的話語，闡明《詩經》、《離騷》與杜詩的特質，意謂講求體格聲調之外，詩歌創作更須以強烈的情感來傳達淑世理想，這部分則是澤園時期尚未充分開顯的詩學議題。周岐的序文是爲《流寓草》而作，我們自然可以將兩項要點統合起來，以「悲壯大雅」來描述方以智此部詩集的特色。但既謂「更有進者」，可知周岐之論的深一層用意，其實是想藉方以智詩來呈現龍眠詩學由「大雅」而上及「悲壯」的進程。故序文接著又說：「吾密之之于風雅，高視古人，津梁後學，學者讀其《博依初集》，可以正所趨歸。」方以智的《博依集》刊行於崇禎六年（1633），風雅之正道已朗現於斯。至《流寓草》，雖然也維持了詩體雅正的基本條件，但與早期的創作趨向仍有不同，其突出處在於：「若其危言高論，酒酣耳熱，撫掌而歌，嗚嗚詠之者，又不勝有憂讒畏譏、悲天憫人之懷矣。」[73]如此的悲壯風格，是由家園殘破、感時傷國的生命苦楚激盪而成，此中情感的強度與濃度，都不是澤園狂生的年少詩作可以比擬。

「悲壯大雅」固然是完美的風格體式，但悲憤情感的過度昂揚，卻也可能損害了詩歌的中和雅正之美，甚至引發亂世之音的疑慮。關於此點，方以智和

[72] 《方子流寓草》，頁 659。
[73] 二語均同前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岐均有所察覺，《膝寓信筆》即說：

> 陳臥子讀余〈七解〉及答舒章詩文，大念之，寄書曰：「君近下筆頹激過當，人無故而如此，不祥。」農父亦深誡余。然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謂何？且當以考究之事，沉潛其飛揚跋扈之氣，可也。[74]

對於方以智的激頹詩風，除陳子龍外，周岐也曾提出深誡，即連方以智自己，也希望藉由讀書考證來沉潛飛揚跋扈的意氣。但情感之悲本自然而發，在時空情境沒有改變之前，並不容易藉由個人的主觀意識強行扭轉，方以智〈再示農父、克咸、子遠舅氏〉一詩即云：「閉門發悲歌，又戒悲歌人。」[75] 二句詩正好說明了自己此時的生命樣態，只能反覆擺盪在「發悲歌」與「戒悲歌」的矛盾循環之中。因而情感之「悲」與詩體之「雅」，如何對諍拉鋸、交錯融合，便成爲龍眠諸子於金陵廣集時期必須面對的課題。

《通雅・詩說》有方以智三子方中履（1638-1688）的跋語，其中提到：

> 老父舊有《龍眠淺說》，直之叔戊寅刻之。[76]

此段文字附在《通雅・詩說》之後，可推斷《龍眠淺說》應該也是一本詩學論著。此書由方其義在崇禎十一年（戊寅，1638）刻出，以時間點來看，正好可以作爲金陵廣集時期的詩學綱領，可惜其書今已未傳。方中履在這裡提到《龍眠淺說》，似乎表示此書的部分內容已改寫進〈詩說〉之中，比如「姑分體裁而言之」一條，旨在說明各體詩作的學習對象與寫作要領；「近代學詩，非七子則竟陵耳」一條，則是評論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的優劣，[77] 這些內容，都帶有早期詩學思考的痕跡。惟史料無徵，僅能志疑於此。[78]

---

74 《膝寓信筆》，頁 20。

75 《方子流寓草》，卷 2，頁 677。

76 清・方以智：《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卷首 3，頁 64。

77 分見《通雅》，卷首 3，頁 58、59。

78 〈詩說〉下題「庚寅答客」，知其文成於順治七年（1650）。但「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一條，文末附記「崇禎壬午夏與姜如須論此而筆之」，壬午爲崇禎十五年（1642），由此亦可證〈詩說〉之中也包含了一些舊材料。此條見《通雅》，卷首 3，頁 59-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諸子離散時期

崇禎十三年（1640）初，方以智赴京應試，龍眠諸子仍然以金陵爲生活中心，但主將的遠行，已開啓了離散的序幕。此年，方孔炤巡撫湖廣，因剿寇失利而遭劾繫獄，新成進士的方以智並無登科的喜悅，反而因父親的蒙難而終日惶惶，詩文之作也由悲壯轉入了悲涼。當時陪伴在方以智身邊的龍眠文友，僅有北遊京城的吳德操一人，方以智於隔年回憶說：「嗟乎！吾舊年不得吾鑑在同啓處，吾其不免矣！以落落之性，覲歷禍患，一迹幽處，仰天槌心，吊影痛骨，苟非有故人，其何以爲生乎！」[79] 幸得友情力量的支持，才使得方以智安然度過這場生命的嚴酷試煉。崇禎十四年（1641），返回南方的吳德操爲方以智作〈激楚顧瞻噫跋〉，也提起這段往事：

> 密之居京師，痛父冤不章，拊膺百結，中宵聞其歎息之聲，則〈激楚〉所由作也。……倉兄斯塡，未敢告苦，迺日積已久，而悲咽之語遂滿於廢紙敝篋中。予嘗反復歎息失聲，此又非揚子雲好深湛攻苦，作〈畔牢〉者比也。噫嘻！郢事之來，實痛之矣，豈其果必楚地而後可〈騷〉哉？若〈顧瞻噫〉，誠可以感矣，何必楚乎？[80]

吳德操曾在京師與方以智朝夕相處，聞其中宵歎息之聲，自己隨之反覆歎息，是以方以智傾吐悲咽之語，不只是關乎個人之事而已，龍眠詩派的成員也有見證而感同身受者。〈激楚〉、〈顧瞻噫〉皆方以智的騷體賦作，[81] 其中，〈激楚〉係因痛念父冤難伸而作，時在崇禎十三年秋；但〈顧瞻噫〉作於崇禎十四年秋，當時方孔炤已獲釋出獄，方以智卻仍顧瞻帝京而愴恍鬱結。可見方以智

---

79 〈吳鑑在北征草序〉，《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33。

80 收入《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18。《漢書・揚雄傳》：「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其文今已不傳。見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卷 87，頁 3515。

81 二賦分見《浮山文集》，〈前編〉，卷 4，頁 515-517、517-5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悲憤之情，不只因爲憂心父親的安危，同時也是北京的生活閱歷，讓他對晚明的政治形勢懷有不安的預感。即崇禎十四年，吳德操回到金陵，在兵部職方主事錢棅（1619-1645）的協助下，刊刻遊歷京師之作《北征草》，書成後寄給方以智，方以智爲題〈吳鑑在北征草序〉，序云：

> 朝宁之間容容爲上，豪黠以擿人爲能，詭語羅繫琯瑗，可以恫恐。人情之變，日益佾張，寓目時事，非復昔比。以當古人游學京師者，感刺骨矣。發爲文辭，尚指其慷慨已甚，得乎？每作成見示，增我泫然，我之泫然，適也。今江南諸士，歌鑑在之詩，不愮愮長嘆者，猶有詩人之情乎哉？余長鑑在五月，畏苦昂藏之什，此時再諷，固難堪也。嗟乎！吳子負才如此而不得遇，又悲我之得遇猶不遇然，親見苦狀，爲之徬徨。是北征本吳子壯遊也，因苦人而苦矣。[82]

以龍眠詩派發展的角度來看，此段論述有三個重點值得注意。其一，吳德操的北征，本欲一覽帝京之盛，但看到的卻是朝廷苟且敷衍、豪黠肆意攻訐、詭言遮蔽正論、人情佾張爲幻等種種荒誕，故而感受深入骨髓，爲詩慷慨成篇，其詩作呈現的是岌岌可危的帝京衰象。其二，吳德操此遊，親見方以智蒙受父冤的苦狀，因而悲人之悲，苦人之苦，使得原本屬於方以智的淒楚詩風，也擴散到了吳德操的詩作中。其三，方以智認爲，沉醉於昇平樂國的江南文士，閱讀了吳德操的北遊經歷，當能感受到暗潮洶湧的時代變局，進而憂愁長歎；依此推之，由方以智首發先聲的悲愴之音，透過吳德操傳播於金陵，也勢必進一步牽動龍眠詩派整體詩風的變化。

龍眠詩人寄居金陵既久，篇什累積遂多，錢澄之曾有《過江集》之選，試圖爲龍眠詩派的流寓作品留下記錄。錢澄之在〈文學劉臣向墓表〉中曾說明此事原委：

> 密之以庚辰通籍。寇躪江北，予輩多流寓白門，而左忠毅公諸子暨密之

[82] 《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33-534。序文云及：「還一月，在錢仲馭所，梓其《北征草》寄予。」錢仲馭，即錢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弟直之謂予敢於任怨，遂共屬予續成其事，於是有《過江集》之選，與吳門、雲間遙爲應和。[83]

詩歌選集代表一個詩派的詩風取向，此項選詩工作應由詩派領袖親自主持，但方以智考取進士而滯留京師，因此，左國棟（1616-1685）、左國林（1617-？）、左國材（1620-1699）兄弟以及方其義等人，推舉任勞任怨的錢澄之續成其事，使得龍眠詩派可以和吳門、[84] 雲間二派遙相應和。觀錢撝祿（1657-1713）《錢公飲光府君年譜》「壬午，年三十一歲」條記載：「選《過江偶集》，府君戇直，諸子推以任事，蓋任怨也。」[85] 錢澄之爲左國棟作〈左眠樵初度序〉亦云：「壬午，刻《過江集》；癸未，刻《過江詩略》，三左子佐予主其事。」[86] 可知《過江集》於崇禎十五年（壬午，1642）編成。隔年，吳德操也加入選詩的行列，《錢公飲光府君年譜》「癸未，三十二歲」條又載：「適吳鑑在自閩至，中道奴挈資去，擬附府君歸。……遂同返白門。冬，與同選《過江詩略》。」[87] 再參照錢澄之〈生還集自序〉云：

> 癸未居白門，與吳鑑在集同鄉諸作，爲《過江詩略》一選，予詩屬鑑在點定，信手抽取，得意者殊少。[88]

又知《過江集》後來釐定爲《過江詩略》，是書由錢澄之、吳德操二人共同選定，時在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冬。《過江詩略》的刊刻，一方面總結了龍眠詩人流寓金陵的詩歌創作，另一方面也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隨之而來

---

83 《田間文集》，卷 24，頁 469。

84 此處的吳門派，當指張澤、朱隗、徐汧（1597-1645）等人形成的詩派，此派與竟陵派淵源頗深。參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294-295。

85 清・錢撝祿：《錢公飲光府君年譜》，附於清・錢澄之：《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頁 183。

86 《田間文集》，卷 18，頁 356。文中「三左子」，指左國棟、左國林、左國材，未含左光斗（1575-1625）長子左國柱（1606-1667）。但廣義來說，龍眠四左皆可歸屬於詩派成員。

87 《錢公飲光府君年譜》，附於《所知錄》，頁 183。

88 《藏山閣集》，〈藏山閣文存〉，卷 3，頁 4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是明清易代的大崩壞，龍眠諸子也將面臨著生命的離散。《過江集》與《過江詩略》中，今存者惟《過江詩略》，此集尚有孤本藏於上海圖書館。[89]

崇禎十七年（1644），明朝面臨亡國，龍眠諸子在戰亂中選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孫臨於順治三年（1646）抗清亡故，周岐在國變後返回桐城故里，吳道凝於順治四年（1647）進士及第，方文則在江南之地採藥賣卜。僅餘方以智、錢澄之、吳德操三人流落於南明境內，延續著龍眠詩派的命脈。

順治三、四年（1646、1647）之交，在闊別數年之後，方以智和吳德操終得相會，方以智〈鑑在變詩序〉云：「延、汀變後，鑑在遇我於蒼梧。」[90] 清兵攻陷福建延平、汀州二府，隆武帝死難，時在順治三年秋，其後方以智與吳德操於廣西蒼梧重晤。乍見而後分別，順治五年（1648）冬，方以智再訪吳德操於桂林，即在此時，自閩地奔赴廣東肇慶（端州）的錢澄之也去信予吳德操，方以智正好得見此信，於是作〈戊子冬來桂林依鑑在，時幼光自閩奔端州，以書與鑑在，見訊信筆寫此〉，詩云：

> 五嶽頂上放聲哭，哭我殘生哭死友。……改啼發嘯伏波門，龍眠幸有三人存。可憐懷中書、囊中筆，崩山倒海不曾失。靈田出紙共揮毫，悲歌且紀天涯日。[91]

歷經痛哭殘生死友的崎嶇路程，來到了可以改變啼哭、引發長嘯的「伏波門」，此門爲漢代伏波將軍馬援所經舊地，其地即在桂林；當下「龍眠幸有三人存」，因爲有方以智、錢澄之、吳德操三人生活於南明，故龍眠詩派依然得以存在。方以智甚至勉勵詩友，當秉持不因崩山倒海而喪失的囊中之筆，對著靈田之紙共同揮毫，讓龍眠三子的悲歌可以紀念這段流落天涯的歲月。收到方以智的來信後，錢澄之作〈得方密之信見寄〉，詩句開端云：「同時亡命五經春，嶺嶠分飛痛甲申。」[92] 寫作此詩，已是甲申分飛五年之後。是時又作〈密

89 見湯華泉：〈整理說明〉，《藏山閣集》，頁 11-12。
90 《浮山文集》，〈前編〉，卷 8，頁 613。
91 轉引自《方以智年譜》，卷 4，頁 154。原詩見《離流草》。靈田，桂林附近地名。
92 《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9，頁 2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與鑑在相依桂水，貽書招予，書懷二十八韻奉答〉，云及：「學士今爲相，臺郎且晉卿。攜孥依北道，給札賦西京。對酒探鬮熟，聯吟并馬行。雙星隨斗出，一雁掠霜鳴。祇覺生存倖，翻悲死喪輕。武公屍不返，農父禍誰攖。密之書來云：「孫武公戰歿，周農父亦罹家難。」白社餘三子，青雲仗兩兄。」[93] 詩中提到，方以智學士獲得永曆帝召聘爲相，只是屢召屢辭；吳德操則由御史晉升到大理寺丞，仕途順利。在方以智攜妻兒北上桂林之後，方、吳得以重聚，二人對酒聯吟，如雙星般隨斗而出，錢澄之反觀自己，卻恰似掠霜而鳴的孤雁。此時，孫臨已經戰歿，周岐也蒙受禍害，原本桐城文人所組成的永社，如今只剩三人，而其中最堪仰仗的正是方以智、吳德操二兄。至順治七年（永曆四年，1650）元月初，錢澄之又作〈酬曼公前輩枉賀用韻〉：

> 宮衣叨著主恩新，笑向同門拜後塵。幾郡偏安稱太史，千秋正統忝詞臣。龍眠流落悲三子，並鑑在而三。鳳沼從容有二人。早望趨朝開史局，毋煩詔使往來頻。[94]

此詩寫作的前數日，也就是順治六年（永曆三年，1649）十二月底，錢澄之授官翰林院庶吉士，此詩前四句寫自己蒙受帝恩，雖然喜悅卻不免忝爲詞臣，所言正是當時的複雜心境。詩作後半段，同樣以「龍眠三子」來稱呼方以智、錢澄之、吳德操，但「鳳沼從容有二人」一句，卻與前詩所謂「青雲仗兩兄」不同。接連下文來看，從容鳳沼者是指仕宦於朝廷的錢澄之、吳德操，相對的，不肯出仕的方以智卻連續辭退永曆帝的召喚，徒使詔使頻繁往來。由此詩來看，錢澄之對於方以智的出仕依然懷抱著希望。

然而，時局變化迅速，錢澄之擔任庶吉士未久，永曆帝即因戰事危急，自肇慶撤退，移蹕梧州。觀錢澄之《所知錄》記載：「時梧州瘴重，死喪無虛日，聞桂林稍清，固請於山陰師，乞賞假三月，往桂林一遊。……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吳廷尉鑑在德操，相距千里，握手無期；兼以閣學屢召不赴，求以

93 《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9，頁 246。白社，此指方以智等人成立之永社。
94 《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12，頁 2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局自效，師因命予要之同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95] 可知，錢澄之再由梧州轉赴桂林，主要目的在於和同鄉友人方以智、吳德操見面，至於山陰師嚴起恆[96]（1600-1651）希望能請方以智前來輔政，恐怕已不是此行的重點。順治七年（1650）中秋，龍眠三子終於在桂林相會，爲龍眠詩派的發展寫下最後的結局，請看錢澄之〈中秋夜至桂林喜晤曼公鑑在〉二首云：

> 苦憶朋簪趁客船，恰逢良夜聚樽前。風塵豈意存吾輩，鬚鬢休驚異昔年。蠻地久居秋乍冷，故人相見月偏圓。亂來此夕皆堪念，震澤雙峰最可憐。乙酉厄于震澤，丁亥予病臥順昌僧舍。
>
> 令節扁舟若與期，相逢猶怪客來遲。繡衣軀幹經時偉，學士歌聲自昔悲。老去弟兄惟縱酒，亂中年月已編詩。龍眠秋色應如舊，今夜何人賦所思？[97]

第一首詩言及：中秋之夜乘著客船，和苦思多年的朋友相聚於樽前，三人有幸得以重見，只能說是風塵中的偶然，容貌縱然異於昔年，卻也無需訝異。如今蠻地已轉秋冷，終於在月圓時分和故人相見，諸人分述亂離，可憐往事又浮上心頭。第二首詩續言：此次駕舟來到，與預期的時間相當，然而渴望重會的友人，竟怪罪來客的到訪太遲。「繡衣軀幹經時偉」，意指仕宦於朝廷的吳德操意氣風發；「學士歌聲自昔悲」，則指身爲學士的方以智歌聲悲哀如昔。老去弟兄們如今重逢，惟有縱酒賦詩，而令人想起的，是那熟悉卻又多年未見的龍眠秋色。值得注意的是，此詩的寫作地點雖不在龍眠，但卻是龍眠諸子對於故鄉的思念，進而確定了龍眠詩派的尾音是「歌聲自昔悲」的悲哀特質。其後，清兵於是年十一月攻陷桂林，順治八年（1651）底，錢澄之返回清人統治下的

---

[95] 清・錢澄之：《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卷 4，頁 123-124。

[96] 嚴起恆，字震生，浙江山陰人，崇禎四年進士。傳見《明史》，卷 279，頁 7154-7155；清・邵廷采：《西南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97 年），卷 4，頁 46-47。錢澄之有〈曼公書至得山陰師死事信〉四首，記嚴起恆死難之事，見《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13，頁 325。

[97] 《藏山閣集》，〈藏山閣詩存〉，卷 12，頁 301。雙峰，在福建延平府順昌縣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桐城；順治九年（1652）除夕，方以智也輾轉回到了故鄉；留於南明的吳德操，則於順治十年（1653）勞悴悲憤而卒。[98] 因此，可以說龍眠詩派的詩學活動終止於龍眠三子的桂林之聚。

龍眠詩派在諸子離散時期的詩作風格，可以參看方以智爲吳德操所作的〈鑑在變詩序〉：

>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龍眠之詩，以雅爲倡，自予數人者始。十五年來，賊擾江北，親友離散。獨鑑在從余燕都朝夕兩年，其所作詩曰《北征草》，余初脫難苦，曾歎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歎離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兩人于天末遐荒，予又得出苗岡，免傭保，爲鑑在序《變詩》，能無再三歎乎？[99]

龍眠之詩原以「大雅」爲準則，此一準則方以智、吳德操都曾經奉守。然而，崇禎十四年（1641）吳德操的《北征草》已感歎愁苦，至順治五年（1648）又彙輯近作曰《變詩》，悲慨益深，此二書顯然逐步偏離了雅正詩風。方以智文中還說道：「今吾子既著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興，采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民勞〉乎？」此處雖然將吳德操的變詩喻爲「變雅」，一如〈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但天下中興不過只是一種想像，欲調和「雅」與「變」的希望終究落空。不僅吳德操的變詩如此，方以智亦然，同文結尾又云：「予既序鑑在《變詩》，隨以天雷所作〈自序篇〉，屬鑑在序之，或又一變也。」[100] 方以智表明自己的詩風，同樣是以變詩稱之。至於錢澄之，則可參看順治五年所作的〈生還集自序〉：

> 黨禍之日，匿複壁中，有〈詠懷〉、〈擬古〉、〈詠史〉詩百餘首，頗多風人遺意，合前此諸作，日置案頭，將反復改訂，欲以是名千秋也。

---

98 吳德操事，詳錢澄之〈吳廷尉鑑在傳〉。文見《藏山閣集》，〈藏山閣文存〉，卷5，頁417-421。

99 《浮山文集》，〈前編〉，卷8，頁613。

100 均見〈鑑在變詩序〉。《浮山文集》，〈前編〉，卷8，頁613。天雷，湖南沅州天雷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豈意震澤之難，竟燼於一炬乎！難後無賴，遇境輒吟，感懷託事，遂成篇帙。既困頓風塵，不得古人詩時時涵泳，兼以情思潰裂，夙殖荒蕪，得句即存，不復辨所爲漢魏、六朝、三唐矣。[101]

崇禎十七年（1644），弘光帝監國於南都，阮大鋮（1587-1646）於此時搜捕復社人士，緊急中，錢澄之將自己的百餘首詩藏於複壁，暫時得以保存；不料隔年清兵南下，其詩作卻焚毀於戰亂之中。這些作品題曰〈詠懷〉、〈擬古〉、〈詠史〉，可知錢澄之此時的詩作仍在於實踐復古理想，時局的動盪、分離的傷感，尚未直接影響其作品。奔往南明之後，並無古人之作可以涵泳，反而因爲困頓於風塵，情思的潰裂，使得錢澄之得以寫出迸發自心靈的詩作。這些詩歌悖離了大雅的風格，近同於方以智、吳德操的變詩，可謂由雅而入悲，由復古而轉憑情思，標註著龍眠詩派在此一時期的詩風特色。

六、結　論

本文試著以桐城、金陵、離散三段不同的時期、相異的地點，來敘述龍眠詩派的形成。「澤園永社時期」是從方以智認識陳子龍而後歸來起算，始於崇禎五年（1632）冬，止於崇禎七年（1634）秋，發生地點在於故鄉桐城；「金陵廣集時期」是從崇禎七年秋到崇禎十二年（1639）底，以方以智的著作而言，此段時間約略是寫作《方子流寓草》之時；「諸子離散時期」則由崇禎十三年（1640）至順治七年（1650），這段時間較長，記錄的是方以智與派中成員分合離散的過程。順治七年冬，清兵攻陷桂林，方以智等人的南明流亡告一段落，龍眠詩派的發展也因而終截。[102] 以詩派成員來說，龍眠詩派的領袖當推方以智，其他成員於澤園、金陵時期應以周岐、孫臨最爲重要，方文、吳道凝次之；值得注意的是，錢澄之、吳德操在金陵時期已逐漸成熟，至諸子離

[101] 《藏山閣集》，〈藏山閣文存〉，卷 3，頁 400。

[102]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於「流離嶺南」一卷，即截止於順治七年。參《方以智年譜》，卷 4，頁 162-1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散時期，又僅以錢澄之、吳德操二子與方以智奔至南方，延續了詩派的生命。

龍眠詩派與雲間詩派關係密切，既然「雲龍」並稱，是以龍眠詩派在詩學史上的意義，必須與雲間詩派相提並論而後彰顯。首先，方以智與陳子龍論詩相合，故在家鄉澤園成立了永社，永社的詩學精神在於力倡大雅，如周岐所云：「永社立十體會，分一題以大雅爲宗。」即使方以智在此一時期也有吐露悲苦之詩，但推尊大雅之作仍是雲間、龍眠的共同理想。崇禎六年（1633），陳子龍爲方以智第一本詩集《博依集》題〈序〉，序云：「去年秋，余游錢塘，遇桐城方密之，出其詩數百篇，諸體都有，大要歸于極古。其才情超烈，有過濟南，而挾旨則同矣。夫以密之之才，豈蹤濟南？軌其競競體裁勿逾古，則有以焉爾，蓋重悲夫儕俗之音而以爲救也。」[103] 此論指明，方以智的才情超越了後七子李攀龍，詩作卻仍然斤斤篤守古法，目的是爲了力矯儕俗之音，故而奉大雅爲依歸。其次，流寓金陵之後，方以智的詩作已多悲苦，雖然「悲壯大雅」也可以是合乎美感要求的詩作，卻也有偏離大雅的危機，陳子龍即曾提出勸告，如方以智〈熊伯甘南榮集序〉云：「臥子覽余《流寓草》，誡予曰：『悲歌已甚，不祥。』」[104] 這樣的告誡，暗示著雲間、龍眠二派終將分途。崇禎十一年（1638），陳子龍再爲方以智第二本詩集《流寓草》作〈序〉，云及：「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爲來哉？……方子負志英偉，必有以自見。異日者海內清晏，父子名在鍾鼎，賜田宅，給鼓吹，歸本州，省丘墓，以視曩者流寓之篇何如也！」[105] 文中雖然將方以智憂愁感慨的詩作說成了盛世之音，甚至預期方以智必能光榮返鄉，讓「流寓」之篇成爲生命的過往，但這樣的說法實投注著陳子龍強烈的主觀願望。最後，在諸子離散時期，雲間三子陳子龍、李雯、宋徵輿於崇禎十六年（1643）編選《皇明詩選》，陳子龍〈皇明詩選序〉說明了編輯用意：

[103] 轉引自《方以智評傳》，頁 282。
[104] 《浮山文集》，〈前編〉，卷 5，頁 539。
[105] 《方子流寓草》，陳子龍〈序〉，頁 663-664。另見明．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年），卷 3，〈方密之流寓草序〉，頁 152-1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迪其意智耳。聖天子方彙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移風易俗，返於醇古。」[106] 即使崇禎朝廷的危難迫在眉睫，陳子龍依然疾呼，此是天子彙集中和、國家景運隆盛的時刻，所論呈現出以大雅之音救國的理念。龍眠方面，錢澄之、吳德操在崇禎十六年編成《過江詩略》，爲龍眠諸子寄寓金陵的詩歌作一總結；清兵入關後，方以智由北京奔往南明，與錢澄之、吳德操共同吟唱出哀歎的變聲，此一哀歌也和雅音作正式的分離。綜之，與雲間詩派堅持大雅，欲以雅音興國的理想相較，[107] 龍眠詩派的詩作是從大雅壯盛之音的追求，轉變爲悲壯，而後更入於悲涼，如實的見證了大明王朝的崩潰與衰亡。[108]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3 年。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

晉・陸機著，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106]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陳子龍〈序〉，頁 5。

[107] 雲間詩派的詩學，可參考《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第三章至第五章。

[108] 本文的重點在於闡述一個詩派的成立，對於龍眠詩派各時期詩作的討論，請俟諸來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

南朝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

宋・蘇轍：《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明・杜騏徵等編：《幾社壬申合稿》，《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明・陳子龍：《安雅堂稿》，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7 年。

明・陳子龍：《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明・陳子龍、清・李雯、宋徵輿編：《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年。

清・李雯：《蓼齋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清・方文：《方嵞山詩集》，合肥：黃山書社，2010 年。

＊清・方以智：《膝寓信筆》，東京：東洋文庫藏，《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清・方以智：《方子流寓草》，《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方以智：《通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

＊清・錢澄之：《藏山閣集》，合肥：黃山書社，2004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錢澄之：《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 年。
清・余懷著，李金堂校注：《板橋雜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清・陳焯等纂修：《安慶府志》，《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
＊清・潘江編：《龍眠風雅》，《四庫禁燬書叢刊》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
清・毛奇齡：《西河文集》，《國學基本叢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清・方中通：《陪集》，《清代詩文集彙編》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清・邵廷采：《西南紀事》，臺北：大通書局，1997 年。
清・方苞：《望溪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清・方苞：《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98 年。
清・廖大聞等修，清・金鼎壽纂：《桐城續修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年。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馬其昶：《桐城耆舊傳》，臺北：廣文書局，1978 年。

二、近人論著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 年。
＊宋豪飛：〈方以智與桐城澤社考論〉，《安徽大學學報》第 33 卷第 6 期，2009 年 11 月。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 年。
＊李聖華：《方文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文新：《明代詩學的邏輯進程與主要理論問題》，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年。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

謝明陽：《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臺北：大安出版社，2010 年。

羅　熾：《方以智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Fang, Y.-Z. (n.d.). *Xi yu xin bi* [Essays in Xiyu]. In *Tong cheng fang shi qi dai yi shu* [The posthumous books of seven generations of the Fangs in Tongcheng]. Tokyo: Toyo Bunko.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Fang, Y.-Z. (2000). *Fang zi liu yu cao* [Collection of the poems Fang Yi-Zhi jots down during wanderings].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Fang, Y.-Z. (2000). *Fu shan wen ji* [A collection of Fang Yi-Zhi's writings].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Li, Sh.-H. (2007). *Fang wen nian pu* [Chronicle of Fang We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an, J. (Ed.). (2000). *Long mian feng ya* [Poem collection of the Long-Mian poetic school]. In *Si ku jin hui shu cong kan* [The banned and burned books during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Beijing: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Qian, Ch.-Zh. (1998). *Tian jian wen ji* [A collection of Qian Cheng-Zhi's writings]. Hefei: Huang Sh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Qian, Ch.-Zh. (2004). *Cang shan ge ji* [A collection of Qian Cheng-Zhi's writing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efei: Huang Sh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Qian, Ch.-Zh. (2006). *Suo zhi lu* [Records of what I know]. Hefei: Huang Sh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Ren, D.-B. (1983). *Fang yi zhi nian pu* [Chronicle of Fang Yi-Zhi]. Hefei: Anhui Education.

Song, H.-F. (2009). Fang Yizhi and a literary society named "Ze She" in Tongcheng.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33*(6), 47-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